

DOI:10.16366/j.cnki.1000-2359.2021.05.12

戴震的训诂学思想对皖派朴学的引领

徐玲英

(安徽大学 徽学研究中心/学报编辑部,安徽 合肥 230039)

摘要:梁启超将清代朴学与汉代经学、隋唐佛学和宋明理学相提并论。清代朴学特别是皖派朴学的鼎盛得益于戴震的开创与引领。戴震经学研究坚持走“由字通词、由词通道”之路。为求一字之“的”解,戴震不仅本之六书发掘文字形体所寓之义,同时还运用古音知识,因声求义,实行音义互求;并且利用前人训诂成果,汇综群籍,择善而从,形成了鲜明的训诂学思想和特色。经其弟子段玉裁、王念孙和王引之等的发扬光大,以校勘为训诂前提、因声以求义以及贯通群籍、择善而从的训诂学思想成为皖派朴学的最大特色,并取得辉煌的训诂学成就,皖派朴学突破地域限制而臻于鼎盛,终成有清一代显赫的学派。

关键词:戴震;训诂学思想;皖派朴学;校勘;因声求义;汇综群籍

作者简介:徐玲英(1972—),女,安徽无为,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学报编辑部编审,主要从事徽学和清代学术史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20FZXB044);安徽大学2020年度校级科研项目(2020T030)

中图分类号:H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21)05-0092-07 **收稿日期:**2021-02-05

清代考据学之鼎盛可与汉代经学、隋唐佛学和宋明理学相提并论,梁启超称此四者“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①。清代考据学以其质朴的学风而被名为清代朴学。清代朴学分吴、皖两派而以皖派为盛。皖派朴学发轫于明末清初的黄生、江永。他们一改宋明空谈陋习,主张由音韵、训诂以求义理。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和严以考据的治学方法的确立,标志着皖派朴学的形成。然而,真正使皖派朴学发扬光大的是戴震。戴震避仇入都,学者或信服而交友之,如王鸣盛、纪昀、朱筠等;或师侍之,如段玉裁、王念孙、任大椿等;或私淑之,如凌廷堪、焦循、阮元等。特别是在戴震弟子王念孙、段玉裁等的标杆性专著如《广雅疏证》《说文解字注》等的影响下,以校勘为训诂前提、因声以求义以及贯通群籍、择善而从的训诂思想成为皖派朴学的最大特色。皖派朴学突破了地域限制,终成有清一代显赫的学派。然而,戴震的草创之功被其弟子的辉煌成就所淹没,学界鲜有关注,本文以训诂学为例,结合戴震弟子的言论与专著,论析戴震训诂学思想对皖派朴学的引领。

一、以校勘为训诂前提的思想对皖派朴学的影响

戴震明确表示训诂当以校勘为前提,因为“自有书契以来,科斗而篆籀,篆籀而徒隶,字画俯仰,浸失本真”^②。字体的屡次变化、传抄的颠倒讹脱,使得精准的训诂也难求经典原义。加上小学费失,即使如《说文》《尔雅》等字书、韵书亦不足为据。所以戴震指出,训诂之始应校订讹谬。由于戴震少年时期就精研《说文解字》,又取《尔雅》及汉儒传、注、笺之存者,参伍考究,打下了坚实的小学功底,加之戴震精通古音,故其能将文字、音韵知识运用于古籍校勘,发现典籍讹误。例如《诗经》:“维天之命,假以溢我。”《传》曰:“溢,慎。”《笺》云:“溢,盈溢之言也。以嘉美之道饶衍与我。”戴震于《毛郑诗考正》中指出,《春秋传》引诗作“何以恤我”,转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页。

② 戴震:《与王内翰凤喈书》,张岱年主编:《戴震全书》,第6册,黄山书社,1995年,第278页。

写讹失耳。《毛传》本《尔雅》释“溢”为“慎”，但《尔雅》本误。戴震指出：“《说文》：‘谧，无声也。’《史记》‘惟刑之静哉’，徐广曰：‘今文云“惟刑之谧哉”。’“谧”有静义。“溢”“恤”皆为“谧”字形体转写讹误。最后戴震总结道：“书之‘谧刑’谓‘慎刑’，伏生《今文尚书》足据。此诗承上文王之德之纯而言。嘉以慎我，我其取之，思取法文王嘉美之纯德，以敬慎也。”至此，戴震不禁感慨“古经难治类若是矣”^①。

段玉裁二十九岁便师从戴震，深得戴震训诂必先是正文字的思想，尝云：“东原师云：‘凿空之弊有二。其一，缘辞生训也。其一，守讹传缪也。缘辞生训者，所释之义非其本义；守讹传缪者，所据之经并非其本经。如孔氏‘虞庠在国西郊’，所谓所据之经非其本经也，而缘之立说，则所释之义非其本义矣。经文之不误者，尚惧缘辞生训，所释非其本义，况守讹传缪之经耶？’所释之经有误，释者守讹传缪，自然谬以千里，所以训诂的前提是校勘文本。段玉裁进一步将其师戴震的校勘实践理论化，将校勘分为订底本之是非和订立说之是非，云：“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也，定其是非之难。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必先定其底本之是非，而后断其立说之是非。……何谓底本？著书者之稿本是也。何谓立说？著书者所言之义理是也。……故校经之法，必以贾还贾，以孔还孔，以陆还陆，以杜还杜，以郑还郑，各得其底本，而后判其义理之是非，而后经之底本可定，而后经之义理可以徐定。不先正注、疏、释文之底本，则多诬古人；不断其立说之是非，则多误今人。”^②

《说文解字注》是段玉裁的代表作。王念孙于书序中誉其为“盖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矣”。段玉裁于许氏之书，除正义借义知其典要、观其会通外，首先校订《说文》讹误，作《汲古阁说文订》。他于《序》中云：“今合始‘一’终‘亥’四宋本，及宋刊、明刊两《五音韵谱》，及《集韵》《类篇》称引铉本者，以校毛氏节次删改之铉本，详记其驳异之处，所以存铉本之真面目，使学者家有真铉本而已矣。”^③明末汲古阁本历经五次删改，《说文》已大失原貌。为还许慎、徐铉《说文》原貌，扫除覆盖于《说文》上的历史尘埃，段玉裁利用形义互求、综贯群书和因声求义等方法，校订《说文》讹误。例如《说文解字》：“读，籀书也。”段注曰：“籀各本作‘诵’，此浅人改也，今正。《竹部》曰：‘籀，读书也。’读与籀叠韵而互训。《庸风》传曰：‘读，抽也。’《方言》曰：‘抽，读也。’盖籀、抽古通用。《史记》：‘绌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字亦作绌。抽绎其义蕴，至于无穷，是之谓读。故卜筮之辞曰籀，谓抽绎《易》义而为之也。”^④后人看来“读”和“籀”二者并非叠韵，所以浅识之人改“籀”为“诵”。段玉裁考证古音，指出“读”和“籀”二者叠韵而互训。他再从字义角度指出，“读”有抽绎、梳理意义以至无穷的意思。“籀”为卜筮之辞，作用就是理卜筮现象之端绪，由卜筮现象演绎出结论。段玉裁从字音、字义两个角度考证了“籀各本作诵”之误。此外，段玉裁还校订许慎立说之误，例如：“参，商星也。”段注曰：“商，当作‘晋’，许氏记忆之误也。《左传》：‘子产曰：后帝迁阍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在，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在是，以服事夏商。及成王灭唐，而封叔虞，故参为晋星。’依此则商当为晋明矣。”^⑤段氏以《左传》的记载订正许慎立说之非。校订《说文》传抄、妄改之误，还许慎、徐铉《说文》原貌，就是不诬古人；校订《说文》立说之误，就是不误今人。

除段玉裁以外，王念孙亦承戴震过庭之训。王念孙为吏部尚书王安国之子。王安国于1756年延请戴震馆于其家，令王念孙从其学。阮元曰：“戴东原先生当代硕儒也，文肃延为公师。……初从东原戴氏受声音、文字、训诂，遂通《尔雅》《说文》，皆有撰述矣。继而余姚邵学士晋涵为《尔雅疏》，金坛段进士玉裁为《说文注》，先生遂不再为之，综其经学，纳入《广雅》，撰《广雅疏证》二十三卷。”^⑥王念孙《广雅疏证》在训诂学上的成就无与伦比，梁启超赞其曰：“《广雅》原书虽尚佳，还不算第一流作品。自《疏证》出，张稚让倒可以附王石臞的骥尾而不朽了。”^⑦

王念孙疏证《广雅》，首先校订张揖和先儒失误。《广雅疏证序》中称：“其或张君误采，博考以证其失；先

① 戴震：《毛郑诗考正》，张岱年主编：《戴震全书》，第1册，黄山书社，1994年，第655—656页。

② 段玉裁：《与诸同志书论校书之难》，《经韵楼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37、333—336页。

③ 段玉裁：《汲古阁说文订序》，《经韵楼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73页。

④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凤凰出版社，2015年，第162页。

⑤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凤凰出版社，2015年，第548页。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⑥ 阮元：《王石臞先生墓志铭》，《研经室续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472页。

⑦ 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8页。

儒误说,参酌以悟其非。……是书之讹脱久矣,今据耳目所及,旁考诸书,以校此本。凡字之讹者五百八十,脱者四百九十,衍者三十九,先后错乱者百二十三,正文误入音内者十九,音内字误入正文者五十七,辄复随条补正,详举所由。”例如《广雅》:“谄诡,美也。”王念孙指出:“诡与谄通。各本皆作‘谄诡,美也。’案二字诸书无训为美者。此因诡下脱去‘也’字,而下文傀美也又脱去‘傀’字遂误合为一条,今订正。”^①

王念孙遵循其师戴震“训诂的前提为校勘文字”的治学之道,重视典籍的文字校勘。他所作《读书杂志》,郭沫若誉之为:“考证学中之白眉,博洽精审,至今尚无人能出其右者。”^②全书共校订了“史部如《逸周书》《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子部如《管子》《晏子春秋》《墨子》《荀子》《淮南子》《老子》《庄子》《吕氏春秋》《韩非子》《法言》,集部如《楚辞》《文选》和部分汉碑”等十七部重要典籍,“校正各书传写讹误、衍夺、倒文等两千数百条,并与《淮南子杂志》后总结讹误之例六十二条,足为校勘古籍之范式”^③。例如《读书杂志·逸周书》:“不明开塞禁舍者,其如天下何。”王念孙指出:“‘不明’上有‘明开塞禁舍者,其取天下如化’十二字,而今本脱之。”文字讹脱,语义不完,达不到教化的目的。王念孙根据两“如化”上下相应、相对而言的句式,认为脱落“明开塞禁舍者,其取天下如化”十二字,并据文献《小称篇》《小明武篇》《吕氏春秋·怀宠篇》论证“如化”皆言其速,最后根据《群书治要》引文,补足脱文^④。王念孙以音考字、音义互求,而又经史互证,故多发明,故陈奂曰:“高邮王石隳先生渊源同出乎戴,故论学若合符节。”^⑤

王引之为王念孙之子,可谓戴震再传弟子。王引之幼承家学,小学根底坚实。他尝云:“夫三代之语言,与今之语言,如燕、越之相语也。吾治小学,吾为之舌人焉。其大归曰,用小学说经,用小学校经而已矣。”^⑥王引之继承了戴震由字通词、由词通道之训诂学思想,“以小学说经,以小学校经”,并形成一定的校改原则,即写官误、槩工误、妄改者,则为之改正。至于异体字、假借字,则不改动。其所作《经义述闻》《经传释词》为训诂、校勘学名作。例如《经义述闻》“威侮五行”条,王引之指出:“某氏传曰‘威虐侮慢五行’,正义曰‘无所畏忌作威虐,而侮慢之,故曰‘威虐侮慢’。‘威侮’二字义不相属,威为暴虐,侮为轻慢,不得合言虐慢也。且人于天地之五行,何暴虐之有乎?威疑当作威,威者蔑之假借也。”并进一步证明威、蔑音近假借,曰:“《小雅·正月篇》释文引《字林》‘威,武劣反’,正与蔑音相近,故借威为蔑,威之为蔑,犹灭之为蔑也。”而且《逸周书》《史记》《说苑》有“蔑侮(侮灭)”词例,故而断定某传与正义释义之误。王引之不仅“以小学说经,以小学校经”,还于《经义述闻·通说下》分析、总结古籍用字行文规律、训诂原则以及致误原由,以指导后学。其总结的致误原由有“衍文”“形讹”“上下相因而误”和“后人改注疏释文”等。例如“后人改注疏释文”例,王引之指出:“经典讹误之文有注疏释文已误者,亦有注疏释文未误而后人据已误之正文改之者。……凡此者皆改不误之注疏释文以从已误之经文,其原本几不可复识矣,然参差不齐之迹终不可泯。善学者循其文义,证以他书,则可知经文虽误而注疏释文尚不误,且据注疏释文之不误以正经文之误可也。”^⑦王引之总结的条例已具有高度的理论性,所以方东树认为:“近人说经,无过高邮王氏《经义述闻》,实足令郑、朱俯首,自汉唐以来,未有其比也。”^⑧

二、“因声求义”之训诂方法对皖派朴学的影响

戴震已清楚认识到“载籍极博,统之不外文字,文字虽广,统之不越六书”^⑨。六书是文字的纲领,纲举则目张。戴震创造性地提出四体二用说,认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为字之体,转注、假借为字之用。由于假借字在文献中广泛存在,“六书依声托事,假借相禅,其用至博,操之至约也”^⑩。假借字字义需要因声求义。

① 王念孙:《广雅疏证》,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50页。

② 郭沫若:《〈管子集校〉引用校释书目提要》,《郭沫若全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6页。

③ 虞万里:《高邮王氏著作集出版说明》,王念孙:《读书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5—6页。

④ 王念孙:《读书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9页。

⑤ 陈奂:《王石隳先生遗文序》,王念孙、王引之:《高邮王氏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2页。

⑥ 龚自珍:《工部尚书高邮王文简公墓表铭》,《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47—148页。

⑦ 王引之:《经义述闻》,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787—789页。

⑧ 方东树:《双学斋札记》卷中之下,清道光十七年刻本,第110页。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⑨ 戴震:《六书论序》,张岱年主编《戴震全书》,第6册,黄山书社,1995年,第295页。

⑩ 戴震:《转语十章序》,张岱年主编《戴震全书》,第6册,黄山书社,1995年,第304页。

“夫六经字多假借，音声失而假借之意何以得？训诂音声相为表里”^①。为寻求通假的法则，戴震作《转语二十章》以发明古音通转的规律，方便学者推求假借字字义。

戴震深谙文字与语言的关系，他在传统训诂方法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使其系统化、理论化，成为清代训诂学一大钤键。例如《召南·鹊巢》“维鸠方之”，《传》：“方，有也。”戴震按：“诗中‘方’‘房’通用。《小雅》‘既方既皂’，《大雅》‘实方实苞’，《笺》云：‘方，房也，谓孚甲始生而未合时也。’是‘方’有‘房’义。《汉书·地理志》‘山阳郡方与’，晋灼云：‘音房豫。’是方有房音，‘方之’犹‘居之’也。”^②《传》训“方”为“有”很是突兀，戴震因声求义，指出“方”“房”音同假借，义为居有，并佐以郑笺、晋灼注，从而使人知其所以然。戴震还运用因声求义法训诂联绵词。联绵词的最大特点是由两个音节连缀成义而不能分割，且形体不固定，意义寄托于声。例如《方言》“佚娒，淫也”，戴震指出：“‘佚’‘娒’二字乃双声，即洑荡也。又‘跌踢’，《广雅》云：‘行失正。’踢音宕，唐与荡、宕虽有平上去之异，本属一声轻重。……皆淫逸之义。”^③佚娒为联绵词，义寄于音，与“洑荡”“跌踢”义同，皆为淫逸之义。戴震利用文字声音揭示通假字的本字，系联同源词、联绵词的异体形式，并用语转表明方言的音变字异，使文字训诂走上科学的轨道。

段玉裁传承其师戴震的思想，摆脱传统训诂受文字形体限制的窠臼，以声音为纽带，贯通汉字形、声、义三者之间的关系。《广雅疏证序》中曰：“小学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义，有今义。六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五。……圣人之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说文解字注》中形音义互求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说文解字》：“朕，我也。阙。”段注：“按，朕在舟部，其解当曰舟缝也。从舟，夂声。……《释诂》曰：朕，我也。此如印、吾、台、余之为我，皆取其音，不取其义。”^④许慎因不明“舟部”的“朕”字何以表达第一人称的“我”，于是阙如。段玉裁指出，“朕”用作第一人称的“我”，为取其音不取义，乃文字之假借，这样就解决了此处的疑惑。段玉裁进一步指出，形、音、义三者，“音生于义，义著于形。圣人之造字，有义以有音，有音以有形。学者之识字，必审形以知音，审音以知义”^⑤，所以因声求义更具有理据。

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是因声求义的集大成者。《广雅疏证序》中曰：“窃以诂训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譬如振裘必提其领，举网必挈其纲。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此之不寤，则有字别为音、音别为义，或望文虚造而违古义，或墨守成训而鲜会通，易简之理既失，而大道多歧矣。今则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苟可以发明前训，斯凌杂之讥亦所不辞。”王念孙指出，声音之于训诂，就如领之在裘、纲之在网，抓住声音这一纲领，便可以至赜而不乱。王引之于《经义述闻》中多处阐释其父思想，曰：“夫训诂之要在声音不在文字。声之相同相近者，义每不相远。”“夫古字通用，存乎声音。今之学者，不求诸声而但求诸形，固宜其说之多谬也。”“故凡字之相通，皆由于声之相近。不求诸声而求之字，则窒矣。”^⑥“因声求义，不限形体”的理论贯穿于王氏父子《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经义述闻》《经传释词》四部著作之中。例如：《广雅》“昌，始也”，王念孙指出：“‘昌’读为‘倡和’之‘倡’。王逸注《九章》云：‘倡，始也。’《周官》：‘乐师教恺歌，遂倡之。’郑注云：‘故书“倡”为“昌”。’是‘昌’与‘倡’通。”^⑦周祖谟盛赞《广雅疏证》，曰：“最大的特点也就在于不泥于前人旧注，旁征博考，参互比证，即音以求字，因文以考义，所以解说精当，往往出人意表。”^⑧

王氏父子也用因声求义法探求联绵词词义。王念孙于《读书杂志·汉书第十六》“连语”条指出：“凡连语之字，皆上下同义不可分训。说者望文生义，往往穿凿而失其本指。”^⑨连语即为联绵词。王念孙反复强调，

① 戴震：《六书音均表序》，张岱年主编：《戴震全书》，第6册，黄山书社，1995年，第384页。

② 戴震：《毛郑诗考正》，张岱年主编：《戴震全书》，第1册，黄山书社，1994年，第597页。

③ 戴震：《方言疏证》，张岱年主编：《戴震全书》，第3册，黄山书社，1994年，第114页。

④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凤凰出版社，2015年，第707页。

⑤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凤凰出版社，2015年，第1321页。

⑥ 王引之：《经义述闻》，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8、571、71页。

⑦ 王念孙：《广雅疏证》，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41页。

⑧ 周祖谟：《读王念孙〈广雅疏证〉简论》，《兰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79年第1期。

⑨ 王念孙：《读书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026页。

训释联绵词只能“因声求义”，不能望文生训。例如他于“踌躇，犹豫也”条指出：“此双声之相近者也。踌躇犹豫，为叠韵，踌躇、犹豫为双声……夫双声之字，本因声以见义，不求诸声而求诸字，固宜其说之多凿也。”^①又于“扬榷，都凡也”指出：“大氏双声叠韵之字，其义即存乎声，求诸其声则得，求诸其文则惑矣。”^②所以段玉裁于《广雅疏证序》中称王念孙“尤能以古音得经义，盖天下一人而已矣。”

正如许威汉所言：“戴震提到训诂音声相为表里，表明了语言与意义的关系，即现代说的声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这就纠正了一千七百年来文字直接表达概念的错觉，成为现代训诂学的精论。”^③马裕藻在研究了戴震转语理论后以为，戴震“在古音学上有这么大的成绩，所以对于六书训诂特见甚多。……段氏之《说文解字注》，王氏之《广雅疏证》，殆无不受其沾灌”^④。戴震的因声求义之法影响了当时的整个学术界，起着导夫先路的作用。除段玉裁、王氏父子之外，程瑶田《果羸转语记》、郝懿行《尔雅疏证》、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钱绎《方言笺疏》、邵晋涵《尔雅正义》等都是对因声求义训诂法的实践运用，他们“就古音以求古义”，超越形体，揭示假借本字、系联大批同源词，训诂之学至乾嘉而臻于鼎盛。戴震对于清代训诂学的发展功不可没。

三、参验群籍的训诂方法对皖派朴学的影响

梁启超于《清代学术概论》中将盛清学风概括为：“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孤证不为立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凡与此事项同类者或相关者，皆罗列比较以研究之”^⑤。梁启超指的正是清代朴学实事求是、言必有据的学风。作为皖派朴学的代表人物，戴震凭借其深厚的文字、音韵和文献功底，自觉地把小学和经史子集贯通起来，“以字考经，以经考字”。其《尔雅注疏笺补序》云：“《尔雅》，六经之通释也。援《尔雅》附经而经明，证《尔雅》以经而《尔雅》明。……为之旁摭百氏，下及汉代，凡载籍去古未遥者，咸资证实，亦势所必至。”^⑥又曰：“广搜汉儒笺注之存者，以为综考故训之助。”^⑦“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⑧

戴震训诂实践便采用了这种字书、经传群籍互证之法。例如他疏证《方言》，便把《方言》写于李焘《许氏说文五音韵谱》之上，实现《方言》与《说文》的互证，然后广泛参验群籍，引用书目多达 101 种，共采书证 3268 条。所引书目经部主要有：《周易》，晋王弼注，唐孔颖达疏；《诗经》，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疏；《古文尚书》，汉孔安国传，晋王肃注，唐孔颖达疏；《尚书大传》，汉伏胜撰；《周礼》，汉郑玄注；《礼记》，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仪礼》，郑玄注；《大戴礼记》，汉戴德撰；《春秋左氏传》，东汉服虔注，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小学类主要有：《尔雅》，汉舍人注，汉魏间孙炎注，晋郭璞注，宋邢昺疏；《说文解字》，后汉许慎撰，南唐徐铉校订；《广雅》，魏张揖撰；《经典释文》，唐陆德明撰；《毛诗草木虫鱼疏》，晋陆机撰；《玉篇》，晋顾野王撰；《广韵》，宋陈彭年撰；《类篇》，宋司马光撰；《说文解字系传》，南唐徐锴撰。正史类主要有：《史记》，汉司马迁撰，宋裴骈《集解》，唐司马贞《索隐》；《汉书》，东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后汉书》，宋范晔撰；《三国志》，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子类主要有：《荀子》，战国荀况撰，唐杨倞注；《老子》，春秋老聃撰；《列子》，列御寇撰，晋张湛注；《庄子》，战国庄周撰；《淮南鸿烈》，东汉刘安撰，高诱注。集类主要有：《楚辞》，汉王逸注，洪兴祖补注；《文选》，梁萧统编，唐李善注；《乐府诗集》，宋郭茂倩辑；《艺文类聚》，唐欧阳询等撰；《初学记》，唐徐坚撰；《太平御览》，宋李昉等撰^⑨。这些典籍或用于疏证词条，或校正传刻文字讹误，皆做到言而有据、孤证不立。

段玉裁继承其师“以字考经，以经考字”的训诂思想注《说文》。其尝云：“余之治《说文》也，以字考经，以经考字，大指本徽郡戴氏。”^⑩其《说文解字注》亦广征博引，遍及小学、经史子集，计 50 余种。小学类主要有：《方言》，西汉扬雄撰；《广雅》，曹魏张揖撰；《释名》，东汉刘熙撰；《玉篇》，南朝梁顾野王撰；《急就篇》，西汉史

① 王念孙：《广雅疏证》，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年，第 191 页。

② 王念孙：《广雅疏证》，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年，第 198 页。

③ 许威汉：《序二》，张岱年主编：《戴震全书》，第 1 册，黄山书社，1994 年，第 6 页。

④ 马裕藻：《戴震原对于古音学的贡献》，张岱年主编：《戴震全书》第 7 册，黄山书社，1997 年，第 576 页。

⑤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第 40 页。

⑥ 戴震：《尔雅注疏笺补序》，张岱年主编：《戴震全书》，第 6 册，黄山书社，1995 年，第 276 页。

⑦ 戴震：《古经解诂序》，张岱年主编：《戴震全书》，第 6 册，黄山书社，1995 年，第 377 页。

⑧ 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张岱年主编：《戴震全书》，第 5 册，黄山书社，1995 年，第 370 页。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⑨ 徐玲英：《戴震〈方言疏证〉引书考》，《古籍研究》，2007 年卷上。

⑩ 王念孙、王引之：《高邮王氏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年，第 116 页。

游撰;《三苍解诂》,晋郭璞撰;《埤雅》,宋陆佃撰;《匡谬正俗》,唐颜师古撰;《通俗文》,东汉服虔撰;《字林》,晋吕忱撰;《五经文字》,唐张参撰;《汗简》,宋郭忠恕撰;《九经字样》,唐唐玄度撰;《类篇》,宋司马光等撰;《佩觿》,宋郭忠恕撰;《说文解字篆韵谱》,宋徐锴撰;《说文解字五音韵谱》,宋李焘撰;《六书故》,宋戴侗撰;《龙龕手鑑》,辽释行均撰;《声类》,曹魏李登撰;《唐韵》,唐孙愐撰;《经典释文》,唐陆德明撰;《一切经音义》,唐释玄应撰;《广韵》,宋陈彭年撰;《集韵》,宋丁度等撰;《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宋毛晃增补;《古今韵会举要》,元黄公绍、熊忠撰。经类主要有:《十三经注疏》,清阮元等撰;《尚书大传》,西汉伏胜撰。史类主要有:《史记》,西汉司马迁撰;《汉书》,东汉班固等撰;《后汉书》,刘宋范曄撰;《国语补音》,宋宋庠撰;《汉制考》,宋王应麟撰;《水经注》,北魏酈道元撰。子类主要有:《吕氏春秋》,秦吕不韦等撰;《风俗通义》,东汉应劭撰;《淮南子注》,东汉高诱撰;《颜氏家训》,南北朝颜之推撰;《齐民要术》,北魏贾思勰撰;《开元占经》,唐瞿昙悉达撰;《列子释文》,唐殷敬顺撰;《北堂书钞》,唐虞世南辑录;《初学记》,唐徐坚等辑录;《艺文类聚》,唐欧阳询等;《太平御览》,唐李昉等辑录;《事类赋》,宋吴淑撰;《小学紺珠》,宋王应麟撰。集部主要有:《文选注》,唐李善撰^①。《太平御览》等大型类书辑录了大量散佚的资料,“古籍散亡,十不存一,遗文旧事,往往托以得存,《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诸编,残玃断壁,至摭拾不穷”^②。《太平御览》《艺文类聚》等类书的运用为《说文》的注解和校勘提供了证据。

戴震作《方言疏证》前,将扬雄《方言》的字与训分别傅于李焘《许氏说文五音韵谱》之上,“字与训两写,详略互见”^③。王念孙模仿戴氏这一体例作《雅诂表》,“取《尔雅》、《方言》、《广雅》、《小尔雅》四书诂训,以建首字为经,而以古韵二十一部分列所释之字以纬之……《尔雅》以黑字,《方言》以朱字,《广雅》以绿字,然全书亦尽用此例”^④,实现训诂的互证。他的《读书杂志》引用书目多达80多种。经部主要有:《周易》;《尚书》,唐陆德明释文;《诗经》,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唐陆德明释文;《韩诗外传》《诗考》;《周礼》,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礼记》,汉郑玄注;《仪礼》,汉郑玄注;《大戴礼记》;《春秋左氏传》,晋杜预注,唐陆德明释文;《春秋公羊传》,汉何休注;《春秋谷梁传》《春秋繁露》《春秋考异邮》《论语》;《孟子》,汉赵岐注。小学类:《说文解字》;《尔雅》,晋郭璞注,李巡注,宋邢昺疏,唐陆德明释文;《尔雅翼》《广雅》《释名》《方言》《广韵》《玉篇》《集韵》《班马字类》。史部主要有《汉书》,唐颜师古注,汉服虔、晋灼、应劭、孟康、苏林、孔文祥注;《后汉书》《魏书》《晋书》《隋书》《唐书》《史论》《逸周书》《通志》;《国语》,汉贾逵注,三国吴韦昭注;《战国策》,汉高诱注,宋鲍彪注,宋姚宏校,元吴师道校注;《晏子春秋》《列女传》《越绝书》《吴越春秋》《汉纪》《资治通鉴》《水经注》《通典》。子部主要有:《荀子》,唐杨倞注;《说苑》《新序》《盐铁论》《潜夫论》《孔子家语》《孙子兵法》;《管子》,唐尹知章注;《商子》《韩非子》《黄帝内经》《周髀算经》《开元占经》;《太元》,晋范望注;《墨子》;《吕氏春秋》,汉高诱注;《淮南子》《论衡》《白虎通义》《风俗通义》《群书治要》《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初学记》《白孔六帖》《太平御览》;《山海经》,晋郭璞注;《世说新语》;《穆天子传》,晋郭璞注;《博物志》《老子》;《庄子》,唐陆德明释文;《文子》《列子》。集部主要有:《楚辞》,汉王逸注,宋洪兴祖补注;《文选》,唐李善注;《文选补遗》。此外还引用了金石类资料,如泰山都尉孔宙碑、太尉刘宽碑阴、宋颉颃碑阴、郟阳令曹全碑阴、秦之罘刻石、秦会稽刻石文^⑤。材料的广泛占有,为王念孙的训诂或校勘提供了大量的文献佐证。

王引之称其父“校订之精,引证之切,触类引申之广,实上追两汉诸儒。训诂略其形迹,而取其精华,贯穿该洽,左右逢源”^⑥。受家风熏陶,王引之为学也旁征博引,毛、郑、贾、孔等传注皆为其所用,甚至援引师友观点予以佐证。他于《经传释词序》中云:“自《九经》、《三传》、秦汉之书,凡语助之文遍为搜讨,分字编次,以为《经传释词》十卷,凡百六十字。”例如“谓”字条,王引之指出:“家大人曰‘谓’犹‘为’也。”为论证“谓”犹“为”,王引之引用了《周易》《诗经》《左传》《史记》《战国策》《国语》《大戴礼记》《晏子春秋》《淮南子》《汉书》《吕氏春秋》《盐铁论》等古籍辞例,特别是《庄二十二左传》“是谓观国之光”,《史记·陈杞世家》作“为”;《说苑·君

① 李晓明:《〈说文解字注〉与段玉裁之校勘学》,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38—41页。

② 永瑤,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第1141页。

③ 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张岱年主编《戴震全书》,第6册,黄山书社,1995年,第666页。

④ 王国维:《高邮王怀祖先生训诂音韵书稿叙录》,《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第306页。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⑤ 程艳梅:《〈读书杂志〉专题研究》,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28—30页。

⑥ 王念孙、王引之:《高邮王氏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2页。

道篇》“则何为不具官乎”，《晏子春秋·问篇》作“谓”；《吕氏春秋·精谕篇》“胡为不可”，《淮南·道应篇》作“谓”……这些别本异文最能说明“谓”“为”意同^①。《经传释词》常引典籍主要还有：《尚书》《礼记》《仪礼》《中庸》《春秋》《后汉书》《韩诗外传》《竹书纪年》《公羊传》《谷梁传》《考工记》《论语》《孟子》《老子》《荀子》《庄子》《墨子》《管子》《列子》《韩非子》《淮南子》《晏子春秋》《春秋繁露》《山海经》《说苑》《新序》《楚辞》《文选》《论衡》，以及贾谊、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著作^②。

王念孙总结一生治学经验曰：“经之有说，触类旁通。不通全书，不能说一句；不通诸经，亦不能说一经。”^③王氏父子紧步其师戴震之武，训诂一字必本六书，贯群经而后为定。所以皮锡瑞称“经学训诂，以高邮王氏念孙、引之父子为最精”^④。

四、结语

不同于吴派朴学以古为尚，皖派朴学求其是。戴震认为六经乃道义之府，为了探寻六经中的微言大义，必须走“由字通词、由词通道”之路。“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⑤；反之，“轻语言文字，是欲渡江河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也”^⑥。为了探究六经中的道义，戴震重视文字训诂，然而文字训诂必以是正文字为前提。为求一字之“的”解，戴震不仅本之六书，分析形体，还运用古音知识，因声求义，实行音义互求；并且利用前人训诂成果，汇综群籍、择善而从，形成了鲜明的训诂学思想和特色。戴震的训诂学思想对皖派朴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梁启超尝曰：“戴门后学，名家甚众，而最能光大其业者，莫如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及念孙子引之，故世称戴、段、二王焉。”^⑦在戴震训诂学思想的指引下，段玉裁和王氏父子取得了前无古人的训诂学成就，皖派朴学也因之臻于鼎盛，戴震的筚路蓝缕之功不可磨灭。

The Guidance of Dai Zhen's Exegetical Thoughts to the Wan School of Natural Philosophy

Xu Lingying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China)

Abstract: Liang Qichao compared the school of Natural Philosophy in Qing Dynasty with the school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Han Dynasty, Buddhism in Sui and Tang Dynasties and Neo Confucianism in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The prosperity of the school of Natural Philosophy in Qing Dynasty, especially that of Wan school, benefited from Dai Zhen's creation and guidance. Dai Zhen's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sisted on the road of "from character to word, from word to morality".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orrect meaning of a word, Dai Zhen not only analyzed the structure of character, discovered the meaning contained in the structure of character, but also used the knowledge of ancient phonology to seek meaning from the sound, and implement the mutual understanding of sound and meaning; and choosed the good based on comprehensive group books. Dai Zhen had formed a distinct exegetical thought and characteristic. Through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by Duan Yucai, Wang Niansun and Wang Yinzhi, the exegetical thought of using collation as the prerequisite for exegesis, seeking meaning from the sound, and choosing the good based on comprehensive group books had become the biggest feature of the Wan School of Natural Philosophy. Breaking through geographical restrictions and reaching its peak, the Wan School of Natural Philosophy eventually became a prominent school of Qing Dynasty.

Key words: Dai Zhen; exegetical thoughts; the Wan School of Natural Philosophy; collation; seeking meaning based on voice; comprehensive group books

[责任编辑 王记录]

① 王引之：《经传释词》，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7页。

② 袁海林：《王引之〈经传释词〉的引据》，《语文研究》，1998年第4期。

③ 王念孙、王引之：《高邮王氏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53页。

④ 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第242页。

⑤ 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张岱年主编：《戴震全书》，第5册，黄山书社，1995年，第370页。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⑥ 戴震：《与段茂堂等十一札》，张岱年主编：《戴震全书》，第6册，黄山书社，1995年，第541页。

⑦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3页。